

《比利·巴德》中关于恶的两种话语

——兼谈与蒙田的契合

陈 雷

内容提要 西方古典哲学认为恶源于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与此相对应，古典政治话语强调国家等级体系中下层对上层的服从。蒙田对前者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作为“终极之恶”，残忍其实是一种理性之恶。深受蒙田影响的麦尔维尔在《比利·巴德》中通过克莱加特对“漂亮水手”的敌意现实地还原了这种恶。然而另一方面，关于恶的古典话语又是一种很有用的意识形态内容：它是一个国家的纪律、战力以及国家生存的保证，因而威尔船长尽管深知它反映的并非客观现实，但作为效忠国家的军官，他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捍卫这种话语。

关键词 《比利·巴德》 恶 理性 自然 蒙田

—

在《比利·巴德》第七章，麦尔维尔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威尔船长勾勒了一幅性格速写。关于这个人物，后文还要作进一步探讨，这里仅就这幅速写中的一个细节提出一个与该小说主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威尔是位酷爱读书的贵族军官，关于他的阅读趣味，作者写道：“他所偏爱的，是这个世界上身居权位、心灵严肃的上层人士自然而然会喜欢看的书：那些描写古今真人真事的书——历史、传记，还有像蒙田那样不落陈规、以诚实态度

和常识精神来思考现实的作家。”^① 蒙田并不是小说中唯一被提及的作家，作为法国革命时期英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伯克和潘恩的名字也曾出现在这部以革命后战争年月为背景的小说中；所不同的是，后两人的思想旨趣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对待革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而蒙田这个名字所指向的观点以及这种观点与小说主题之间的联系却远不是那么清楚。威尔船长究竟会从这位16世纪的法国怀疑论者那里看到什么别具吸引力的东西呢？

关于蒙田对《比利·巴德》的影响，学者们已做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② 由于威尔在小说中最主要的行动是召集临时法庭判处无辜的比利死刑，因此评论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蒙田关于法律、正义、权威、仁慈和权变的论述上——蒙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散见其《随笔集》中《论经验》、《论功利与诚实》、《论习惯》等篇章中。笔者在此无意质疑这些篇章对我们理解小说的启示作用，但尝试变换思路，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蒙田一篇并不直接讨论法律和政治问题的随笔上来。事实上，这篇题为《论残忍》的随笔也未曾被细心的批评家所遗漏：在罗·舒尔曼探讨蒙田与《比利·巴德》关系的论文中，就引述过《论残忍》中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自然亲手在人性中植入了一种非人性的本能。”^③ 不过，尽管这句话的措辞和意蕴与小说第11章中提到的“自然堕落：一种出于自然的堕落”（《比》：441）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舒尔曼却并未就此做任何评论，而是迅速把注意力拉回到法律、正义问题以及《论习惯》等更常被谈及的篇章上去了。那么这条被忽略的线索究竟有无价值呢？本文的探讨将从舒尔曼停步的地方开始。

如果残忍确实是自然亲手在人性中植入的一种非人性本能，那么具体说来这种本能究竟被造物主植入到灵魂的哪一部分了呢？此问题看似突兀，但提出它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论残忍》中的思想潜流却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一个现成的答案已经蕴含在上面所引的这句陈述中了。在蒙田耳濡目染内化于心的古典哲学传统里，人的灵魂一致被认为是由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部分组成的——前者由

① Herman Melville, *Billy Budd, Sailor*,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p. 2380. 引文采用周珏良译本并作了较大改动，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431页。后文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周译本）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W. G. Kilbourne, Jr., "Montaigne and Captain Ve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33, No. 4 (Jan., 1962), pp. 514-517; Robert Shulman, "Montaigne and the Techniques and the Tragedy of Melville's *Billy Bud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6, No. 4 (Autumn, 1964), pp. 322-330.

③ Robert Shulman, "Montaigne and the Techniques and the Tragedy of Melville's *Billy Budd*", p. 326; Michel de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trans. M. A. Screech,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 484. 后文出自蒙田《随笔集》英译本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 *Essays*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神赋予，是人神共有的属性，后者则把人拉回到卑下的动物界，是一种需要理性时时加以管束的危险之物。在《理想国》第九章，深为蒙田推重的柏拉图曾为这种灵魂模型给出过一个很直观的说明：灵魂好比一个由人、狮子和多头巨兽组成的复合体；“人”是灵魂中理性因素的化身，“狮子”和“多头巨兽”则分别代表非理性的激情与欲望。当“人”有效控制住“狮子”与“多头巨兽”时，灵魂就处于“正义”的状态；相反，当灵魂的主导权由于“人”的孱弱而旁落到两只缺乏理性的野兽手中时，灵魂就会陷入非正义的颠倒混乱。^①人在正义灵魂的控制下表现出有德性的行为，在非正义灵魂的控制下则表现出堕落与败坏。换言之，“善”全是理性之功，而“恶”则悉可追根溯源到以兽为表征的非理性之中。回到前引关于“残忍”的说法，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讨论对它作出这样一种阐释：蒙田所说的“非人性”倾向正好对应于灵魂中的兽性部分，而人之所以有时会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残忍，是因为此时他灵魂中的“兽”相对于“人”而言占据了统治地位；换句话说，他此时只是外表看起来像人，骨子里却早已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归根到底，“残忍”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造成的一种恶，要克服这种恶，人必须让理性重新在他的灵魂中恢复支配性地位。

不过这真是蒙田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吗？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关于残忍的特点与属性，《论残忍》中下面这段话包含了一些有用的提示：“要不是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人间有这样的魔鬼，仅仅是为了取乐而任意杀人；用斧子砍下别人的四肢，绞尽脑汁去发明新的酷刑、新的死法，既不出于仇恨，也不出于利害，只是要看看一个人临死前的焦虑、他可怜巴巴的动作。”（*Essays*: 484）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绞尽脑汁去发明”（*sharpen their wits to invent*）这一说法；它提醒我们，作为恶之一种，残忍最突出的特征并非它与非理性情欲间的纠缠，而恰恰是它与理性、理智的紧密关联——《随笔》中记录的古今种种骇人的酷刑无一不见证着发明者的邪恶智能（*see Essays*: 820 - 821）。换句话说，残忍似乎是一种前文给出的理论框架所无法解释的恶，它与肉欲截然不同：“当肉欲恶性发作时，我们会受它的控制，理智一点不起作用。”（*Essays*: 481）但当残忍被激发起来时，理智非但没有瘫痪，反而非常积极地参与到了这种恶之中。

残忍与理智之间的关联性在蒙田文中另一处叙述中也得到了印证。除了对自

① 详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0-382页。

己的同类表现出残忍之外，蒙田还多次提到人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如：“追杀一头无辜的野兽而心里满不在乎，这在我是实在做不到的；野兽毫无防御力，又没有冒犯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麋鹿筋疲力尽，没有生路，会跪在追猎者面前，用眼泪向他苦苦哀求……”（*Essays*: 484 - 485）蒙田此处并不是在隐喻意义上描写人与动物的关系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把这幅图景和柏拉图灵魂模型中的隐喻性人兽关系做一个对比。在柏拉图那里，具有威胁性的是狮子和多头兽，而人作为理性的化身则是唯一能驯服这两种野兽并使之和平相处的正义力量。可是在蒙田这里，人和兽的关系却完全颠倒过来了：理性的人成了残忍行为的施行者，而非理性的动物反倒成了这种行为的无辜受害者。尽管蒙田例举的动物是温和的麋鹿，但如果人执意残忍，那么即便是最凶猛的野兽恐怕也难逃与麋鹿相同的命运。事实上，尽管我们经常把“残忍”这个词套用在某些猛兽身上，但动物一般不会从折磨对象中获得快感：理性是这一快感的必要条件，而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如此一来，“残忍”这种恶再次与理性——或者说灵魂中“人”的那部分——挂起钩来。

残忍既然与理性关联，前面那种柏拉图式的关于恶的解释就多少有些可疑了。对于上文提出的“非人性本能究竟植根于灵魂哪一部分”这一问题，蒙田这位“不落陈规、以诚实态度和常识精神来思考现实”的作家似乎得出了一个与传统解释完全相反的结论。古典理论用来解释“肉欲”或许还算恰切，但“残忍”这种恶看起来却更像是源于理性自身的腐败而非单纯激情与欲望的发作。可“理性”这样神圣的东西也会败坏吗？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蒙田似乎并不觉得这一点值得大惊小怪，文中他在作自我剖析时写道：“我发现，我的作风往往比我的观点更规矩，而我的欲望反不如我的理性更腐化。”（*Essays*: 479）虽然此处蒙田说的只是他自己，但他向来是通过观察自己来考核道德哲学命题之真伪的；既然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理性的败坏，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一点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去呢？当然，蒙田在《论残忍》中并没有公然挑战占据优势的传统哲学话语。在他给出的定义里，“德性”依旧表现为高贵的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抑制：“积极遏制情欲的增长，一有骚动，就立刻行动，阻止其发展并发奋战胜它。”（*Essays*: 476 - 477）但通过点出残忍与理性间的紧密关联，蒙田又不动声色地瓦解了这套理论。于是我们从蒙田那里便得到了一隐一显两套话语，显的来自古典哲学，隐的来自实际观察，前者把恶归咎于灵魂中的“兽”，后者则把它归咎于灵魂中的“人”。

二

美德与恶行都起于灵魂的内部，而《比利·巴德》讲述的则是一艘战船上发生的故事，那么灵魂与战船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战船与灵魂之间最突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内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等级体系(hierarchy)。前面说过，古典哲学家普遍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部分组成的，后者天经地义应服从前者的指挥；与此类似，战船上的人员也被严格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前者由船长及其手下军官组成，后者则包括为数众多的战士、水手和勤杂人员，自上而下形成一条完整的指令链。事实上，正是由于两者都具备这一特征，船和灵魂也经常被作家、哲学家用来作为国家的隐喻。关于《比利·巴德》以及麦尔维尔其他航海小说中对“船-国隐喻”的使用，评论家已多有探讨，此处无须赘述，^①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隐喻虽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传布甚广，但最早对它加以发挥的著作却依旧是柏拉图的《理想国》。^②无独有偶，同样是在这部书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灵魂-国家对应论”的最早表述——此书的主题是探讨“何为正义”，但由于灵魂内部的正义很难看清，因此苏格拉底建议先观察比灵魂大得多的城邦中的正义，然后再回过头“由大见小”地研究灵魂中的对应物。^③既然灵魂、由灵魂主宰的人、舰船、舰队乃至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具有相同构造的东西，那么蒙田在《论残忍》中对灵魂所作的分析当然也可以应用到《比利·巴德》中的战船上来。如果说苏格拉底的研究方法是由大见小的话，我们要做的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灵魂（这一小物）为参照，来看一看这艘名为“战力号”的“74门炮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漂亮水手”比利被从商船“人权号”强征来服役；兵器长（即舰上的警察总长）克莱加特对比利产生敌意，处处与他为难；兵器长设套诱比利卷入哗变阴谋，未果后直接向船长诬告比利；威尔让两方对质，比利无故蒙冤，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兵器长；威尔召集临时法庭，判处比利死刑；未几，“战力号”遭遇敌舰，经交火取胜，但船长却负伤身死。

^① See Tracy B. Strong, “‘Follow Your Leader’—Melville’s *Benito Cereno* and the Case of Two Ships”, in Jason Frank, ed., *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Herman Melvill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3, pp. 281–282.

^② 详见柏拉图《理想国》，第235–236页，488a–489a。

^③ 详见柏拉图《理想国》，第57页，368d–368e。

判处比利死刑无疑是小说争议的焦点，但无论读者对此裁决持何种看法，不可否认的是威尔做出这一决定时是不带任何私意的。在面对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突发情况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在于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事态失控并全力维持军心的稳定。小说中曾多次强调“战力号”事件的特殊背景：一方面是外敌当前，形势危急，另一方面是本国海军诺尔舰队上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叛乱。虽然该事件最终通过恩威并施得以平息，但它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全体前线指挥官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他们不得不像医生观察病人身体状况一样密切注意自己舰只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如果说诺尔叛乱是“一次传染性热毒的大爆发”（《比》：425），那么威尔们的任务就是将一切有可能引起热病再次发作的因素都扼杀在萌芽状态。小说中“战力号”的机体险些染上一场大病，而这场幸被阻断的恶疾的最初症候便是克莱加特对比利无故抱有的敌意。细察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敌意与蒙田所分析的“残忍”有很多相似之处。

前文说过，“残忍”这种恶是与理性紧密关联的，而论地位，身为军官的克莱加特就正好属于战舰上的统治阶层，亦即“战力号”这个放大的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他的个人特质与这一身份也颇为匹配：理性成分顾名思义应当是富于“心智”（intellect）的，而据描述，克莱加特的额头“依颅相学来说显示此人具有过人的智能”（《比》：432）。事实上，就心智发达而言，他与热爱阅读、“对一切智性的东西都抱有浓厚兴趣”（《比》：431）的威尔船长不无相似之处。^①当然，威尔处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克莱加特则身居其下游，这使得两人之间的差别看起来好像很大，但似乎是为了拉近两者距离，叙述者又特别强调克莱加特落魄前的高贵身份：“他整个形象和举止都指向一种与其海军职务颇不相称的教育和生涯，在非执行任务时，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地位和品德都很高的人，出于某种原因隐匿了自己的身份，乔装出现在船上。”（《比》：433）关于他匿名的原因水手中间也有一则传言，说这位兵器长曾是个诈骗犯，“他自愿加入海军是为了了结他在法庭上被控的一桩欺诈案”（《比》：433）。换句话说，克莱加特是个类似于撒旦的“堕落天使”式人物，他原先在等级体系中居于高层，后来却因道德败坏而被贬斥到与下层社会交界处的边缘地带。前文曾引述过蒙田的说法——“腐化的理性比欲望更加堕落”，如果我们要给“腐化的理性”这种抽象的东西赋予一个肉身的话，克莱加特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符合条件的人选。

^① 威尔这个人物其实是从克莱加特形象中分离出来的，两人在作者心中原为一体，因此共有很多特点（see Kevin J. Haye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Herman Melv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9-100）。

蒙田还曾注意到残忍并非源于欲望或激情（“它既不出于仇恨，也不出于利害”），这一特点在克莱加特对比利的敌意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敌意似乎没有任何来由，对此叙述者也深感困惑：

编一段情节，让克莱加特的个人生活史与比利·巴德发生某种不为后者所知的交汇，或是让克莱加特在舰上遇见比利·巴德前早就对这位青年水手有所耳闻——这种情节并不难编造，而且这么一来，不管有趣没趣，事情至少就不再会那么令人费解了。但问题是诸如此类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如果凡事总得有个理由的话，那么这件事的真实理由中所包含的神秘因素恐怕丝毫不会少于雷德克里夫笔下的神秘故事。（《比》：439-440）

显然，我们在此面对的是一种极为特殊、无法以常理度之的恶。普通的恶多少都有欲望和激情参与其中，而做出这种“小恶”的人也多半都进了班房或上了绞架；但克莱加特的恶却是“丝毫不掺兽性（brute）杂质的”，他这样的恶人“无一例外都具有突出的智能”，他们善于掩饰装扮并因此常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比》：441）。既然这种恶无法用非理性来解释，那么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它归因于理性自身的堕落了。就这种堕落非出于任何外力而言，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自己发生”的现象；换言之，它是无法解释的（是谓“恶之神秘性”[《比》：442]），而只能用类似于“它即是它”的重言式命题来加以说明。事实上，叙述者用来说明它的一个据称出自柏拉图的定义就恰好是这样一个重言式命题：“自然堕落：一种出于自然的堕落。”前文曾指出此话大致相当于蒙田所说的“自然在人性中植入了一种非人性的本能”，而上述讨论再次表明，这里所谓的“非人性本能”和我们常说的“动物性本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战力号”这个微型城邦中与灵魂的动物性部分相对应的当然是“人手众多的下层甲板世界”（《比》：432）。这是一个舰上统治集团需要时时加以提防的群体，而刚刚发生的诺尔叛乱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不过就近观察，我们却很难看出这个群体具有任何主动威胁的倾向；事实上，与其说它像柏拉图笔下那难以制驭、令人畏惧的多头巨兽，还不如说它更像蒙田所描写的被猎人逼得筋疲力尽、最后走投无路只得俯首就擒的动物。由于海军人员紧缺，比利以及其他许多水手都是通过与捕猎无异的强征方式（“impressment”）被抓到“战力号”上来服役的。在表现比利对待强征的态度时，作者特地用了一个关于动物的比喻：

“至于说被强征入伍这个事，他的态度就像他一般对待天气变化一样；他不是个哲学家，但和动物一样，在实践上他不自觉地是个宿命论者。”（《比》：420）动物不得不是宿命论者，因为它的命运是掌握在人手中的。如果说比利的听天由命还部分地与他年轻无家累有关，那么长期在战船上当下层海员的经验也会让人学会用宿命论的态度来看待一切，水手中的智者“老丹麦人”便是这样——“漫长的经历教给他一种苦涩的审慎，那就是不干预任何事情，也不给予任何劝告”（《比》：449）。他很早就看出克莱加特对比利怀有敌意，但除了给比利一个含糊的告诫，他很清楚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水手们动物般的无助也使克莱加特愈加肆无忌惮；当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发起急来的猎物一拳打死，但他死于猎物之手这一情况并不能改变“战力号”上的恶源于战船的理性部分这一事实。

三

克莱加特的堕落是理性自己发生的堕落，就其无任何外因而言，它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过，在它已然跨出神秘的第一步之后，使其继续转化为现实恶意的便是有迹可循的外部刺激了。比利的出现之所以会对克莱加特造成巨大刺激，是因为两人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比利所是正好就是克莱加特所不是的。要正确理解后者对前者的反应，我们必须先知道比利到底“是”什么。

比利在小说中是与“野蛮人”这个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许多方面都和一个品性端正的野蛮人没什么两样；在撒旦化作彬彬有礼的蛇钻到他身边以前，亚当应该也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的。”（《比》：423）亚当和夏娃一吃下禁果便有了自我意识，比利则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抱朴含真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说，与一条圣伯纳犬所拥有的差不多。”（《比》：422）自我意识是与“思”联系在一起的，它先是把“我”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接着又在自我内部把积极、理性的“我”与被动、感性的“我”隔离开。缺乏自我意识表明这样的割裂尚未发生，换句话说，在比利的灵魂中，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个要素还没有分化并形成等级，它们之间的冲突也还没有开始。^①

既然割裂与分化是灵魂中理性因素过度发展的结果，那么可以预料的是，在

① 麦尔维尔对比利·巴德的刻画颇符合弗兰克·克莫德所谓的“浪漫主义意象”（参见拙文《中产阶级与浪漫主义意象——解读〈最漫长的旅程〉》，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5-14页，特别是第7-9页）。

比利那依然葆有童真的健康心灵中，智能的发展必定不会超过一个合理的限度：“他心智并不算敏锐，更没有蛇那样的机巧……但他的聪明却恰好能匹配一个尚未偷尝知识之果的健全人所生就的端正品性；他不识字，因而不能读书，但他会唱歌，有时还和不识字的夜莺一样自己作曲。”（《比》：422）歌唱是情感的艺术表达，比利善于以歌抒情表明他的情感不但细腻丰富，而且还能与心智默契配合。不过，由于理性尚未成为心灵的主宰，文明人所掌握的控制激情的技巧对于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在他身上有时表现为一种生理缺陷：“在强烈情感的刺激下，他那非常好听就像表达了内心和谐的嗓子会突然发不出连贯的语音，变得结结巴巴，甚至更糟。”（《比》：424）

这样一个灵魂当然也会有它的嗜欲（appetites），不过嗜欲本身并不是罪恶；它只是一种“自然的”需求，真正有罪的是滥用欲望，而“滥用”这个动作必然是有与理性相关的意念作为其主体的。比利也会光顾舞厅、酒馆之类被水手称作“琴师的草地”的去处，但作者认为这不能与文明世界中的恶相提并论：“难道这些常常光顾‘琴师草地’的水手身上就没有劣性（vices）？当然不是；不过他们的劣性很少像陆上人那样掺杂心术不正的成分；它们不是恶意的产物，而更多来自被长期海上生活禁锢住的旺盛生命力，是一种合乎自然法则的率性。”（《比》：423）“陆上人”又被称为“城邦人”（citified man）（《比》：423），而结城居住是一种与自然状态根本对立的生存状态。据此，再结合水手身上那种逆来顺受的动物性（动物和自然是浑然不分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作为一个整体，以比利为代表的下层水手在性格、行事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是文明时代里最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一群人。

一旦弄清了比利是什么，他的对立物克莱加特便可以从反面加以界定了。如果比利代表的是堕落前的人类的话，那么克莱加特作为该隐之城的公民兼化身就理所当然地是堕落后人类的写照了。^① 堕落是从吞下智慧果开始的，因此堕落的人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智性部分的过度发展。在下面这段对兵器长的外貌描写中，作者似乎有意暗示他体内的“欠缺”与他发达的智能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他的额头显出过人的智能，上面半盖着黑发，恰好衬出脸色的苍白，和水手们的古铜面色形成了奇特的对比，这部分是由于他因职务关系不大见光，但却也提示此人体

① 自然人与堕落后人之间的差异也宏观地反映在“人权号”与“战力号”的差异上：前者近似于平等的“自然社会”，后者则等级森严，其理性（克莱加特身为其一分子）与非理性部分是明显分裂的。当然，这样一种分裂是有益于纪律和战斗力的；城邦即便不纯为战争服务，它也需要赢得战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质和血液中似有某种欠缺或不正常之处。”（《比》：432-433）把这段话与对“心智刚好匹配端正品性”的漂亮水手的描写作一个比较，作者的用意就更加明显了：“漂亮水手是力与美的结合。……在飓风里去卷顶帆的总是他，两脚蹬在帆桅上就像扣在马镫里，两手拽着帆绳就像挽着马缰绳，看上去如同亚历山大大帝驾驭着他的坐骑‘贝塞法里’一般……一个人的品质（moral nature）是鲜有不与外表相匹配的。”（《比》：416）灵魂处于自然和谐状态中的比利是美的，反之，灵魂处在分裂状态中的兵器长即便不是丑的，也必定是大大逊色的。以后者之敏锐，他当然不会感觉不到漂亮水手的人格吸引力。事实上，他不仅能够“审美地感觉到”这种魅力，还能“智性地理解和欣赏比利·巴德的美所代表的道德意义”。他知道这种美并非一般男子汉的英俊勇武，而是源于自然状态下才有的身与心的和谐：“比利·巴德的漂亮外表、健康身体和青春气息……都是一种天性的伴随物；这是一种不知有害人之心、从未被蛇的诱惑所损坏的素朴天性。”（《比》：443）克莱加特像席勒笔下的“感伤人”一样羡慕这“居住在比利的身体内……并使其成为‘漂亮水手’”的品质，但糟糕的是，就像成人再也无法回到童年一样，比利身上的这种品质是克莱加特这样已然身心失衡、理性感性分裂的人再也无法复得的东西：“他看到那勇敢而无忧的品性，自己也很想拥有它，但却毫无希望。”（《比》：443）^①

由于没有复得的希望，克莱加特对比利的欣赏转化成了一种深深的“嫉妒”，进而又发展为一种强烈的“反感”，并最终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被作者称为“原初的邪恶”（elemental evil）（《比》：443）的恶意。这是一个大有深意的说法，因为“原初”一词很自然会让人联想起“恶”第一次在世界上产生时的情形。作者在小说中曾多次把兵器长与蛇和恶魔并提。基督教神学家一般认为撒旦对人类的敌意起于他嫉妒亚当的完美和幸福，^②而这两种东西都是他自己因背叛上帝而彻底失去的。忠实于这一神学传统的弥尔顿在《失乐园》第四卷中就曾这样描写撒旦在乐园中初次看到人类之后的感受：“啊，地狱！我这悲愁的眼看见了什么？这些异质的生灵，被提升到我从前的地位，他们虽是地之所生，……却比天上光辉的精灵所差无几。这不能不使我心生惊奇，甚至到心爱的

① 脱离自然状态的人对自然状态的感伤式羡慕是席勒的美学著作《论素朴诗与感伤诗》的理论出发点，关于席勒对麦尔维尔的影响，参见 Shirley M. Detlaff, “Counter Natures in Mankind” —Hebraism and Hellenism in Melville's *Clarel*, in John Bryant and Robert Milder, eds., *Melville's Evermoving Dawn: Centennial Essay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6-197. 关于席勒理论的介绍可参考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47-449页。

② See A. C. Pegis, ed., *Basic Writings of St. Thomas Aquinas*, vol. 1,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 pp. 587-588.

程度，他们如此生动地反映着神圣的面影，创造者的手在他们身上灌注许多优雅的素质！”^①人类的美与幸福让撒旦惊奇甚至爱慕，但同时又在他眼中升起“悲愁”，令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啊，地狱”。后一种情绪驱使撒旦加速实施摧毁人类的计划，而一想到人的幸福马上就要终结，一种恶毒的快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啊，优雅的一对情侣，你们不曾想到你们的变故已经迫近，这一切的欢乐都将幻灭，陷于灾祸。”^②这样一种恶意便是所谓“原初的邪恶”；其原初性在于，当撒旦这样恶毒地窥视人类时，整个世界都还处在一种宁静的无辜状态之中，人与自然（包括内在自然）尚未分裂，自我意识尚未开启，人类后来所知所犯的一切恶都还没有发生。就人的诸恶都以此为祖而言，原初的邪恶确实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而这种恶意与蒙田探讨过的残忍显然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发自理性，它们被施予的对象也都是处于理性掌控之下的无辜的人和动物，而理性之所以恨这些无辜者，除了因为自己已不再“是”无辜的自然之外，别无其他理由。^③残忍付诸行动便是虐待，而“虐待”和“滥用”实质上是同一种行为（即“abuse”）。前面说过，感官欲望本身并不是恶，它们只是人之“自然”，真正的恶是对它们的“滥用”。虽然滥用欲望看起来很像是欲望本身的放纵，但往回追溯，它们真正的起源却是发自理性的恶意与残忍。多头巨兽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恶意的产物。蒙田称残忍为“诸恶中的终极之恶”（the ultimate vice），并说他“痛恨残忍甚于痛恨其他一切罪恶”（*Essays*: 481），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四

作品中除克莱加特外，舰上还有一人也“理解巴德所代表的道德意义”，书中虽未明言，但此人无疑就是在心智能力上与克莱加特相伴的威尔船长。威尔初见比利就觉得他像个再世的亚当，而他对比利打死兵器长一事也有直达本质的理解。如果说比利是自然之子、克莱加特代表败坏的理性的话，那么在这部高度对

① 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② 弥尔顿《失乐园》，第145页。

③ 席勒描述的情感与此同源但相反：“我们对自然寄予一种热情和感伤的敬意，……仅仅因为它们是自然。”（《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章安琪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称的小说中，威尔的角色显然就应该被界定为“好的理性”。好理性和坏理性都倾慕自然，所不同的是前者像父亲对待稚子一样爱护自然。当然，好理性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效忠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城邦：“我们佩戴肩章是表示要对自然效忠吗？”威尔自问自答道，“不，我们效忠的对象是国王……身为国王的军官，我们的职责早已经不在自然的范围之内了。”（《比》：468）

在应该如何处置比利这件事上，自然与国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开释比利是自然正义的呼声，但战船作为国家的化身却要求捍卫等级、纪律以确保自身的“战力”。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总是难以调和的。比利远非罪不可恕，要放在平时，威尔完全可以灵活处理这起案件，而法律本身也不乏宽宥某些杀人行为的特别条款。^①但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威尔终究还是放弃了宽大处理的想法，转而认定尽快处死比利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在这位指挥官心中同时压倒情理、法理这两个因素的是被他称作“军事形势要求”（military necessity）的东西。“军事形势”既指外部敌情，也指舰船这一战斗个体的内部健康状况。在大敌当前、人心不稳、战船又突进在外单独执行任务的特殊情况下，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指挥官必须考虑这一决定对战船内部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威尔下面的这番话（出自他长篇法庭发言的结尾部分）就清楚地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考量：

在当前情况下，就算轻判是明显合法的，也要考虑一下这样宽大会有什么后果。船员们都有朴素的常识（native sense），都熟悉我们海军的习惯和传统；他们会怎么看？就算你可以向他们解释——而以我们军官的身份这是不允许的——这些长期以来习惯于服从独断纪律的人也不可能明智地加以辨别。不，对他们来说，前桅手的行为，不管你在通告里怎么说，都明明白白是桩在叛变中悍然犯下的杀人罪行。这应当怎么判，他们知道。但是没这么判，为什么？他们会琢磨。你们都很了解水手，难道他们不会回想起最近在诺尔发生的骚乱吗？会的。他们知道大家都害怕，知道骚乱在全国造成的恐慌。你们从轻判罪，他们会认为是软弱。他们会想我们退缩了，我们怕他们——怕在这个时候执行法律所要求的严厉判决，以免引起新的麻烦。他们这么揣测对我们会是多大的耻辱，对纪律又会是多么大的损害。（《比》：

① 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威尔为达到处死比利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了法律（see also Richard H. Weisberg, *Failure of the Word: The Protagonist as Lawyer in Modern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4 - 156）。

显然，在威尔看来，决定应当如何处置水手巴德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这一处置方式最终会如何被舰上的下层群众理解和看待。这群人据称是无法对事情真相“明智地加以辨别”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本身就心智有限（“native sense”可解作“基本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军规“不允许”指挥官对他们做出任何解释。为什么不允许解释？答案很简单：因为军官与船员之间除了“命令—服从”不能有任何其他性质的关系。“解释”不是命令，而是说理，可说理就意味着理性部分已经把非理性部分当做平等对话者看待了，这岂不是模糊了两者的界限，打乱了舰上严格的等级秩序？如果仅仅试图做出解释就会被认为坏了规矩，那么“在军心浮动之时，一个水手在海上杀死了他的上级，却没有被判处死刑”，这又将会给纪律带来怎样的损害？威尔的长篇讲话富于哲学意味，他的听众——充当临时法庭法官的三位军官——未必句句都能理解，但上述关于纪律和权威受到威胁的警告却“最有效地打动了他们作为海军军官的本能”（《比》：470），促使他们接受了船长提出的量刑建议。尽管小说中并没有出现“多头巨兽”的意象，但在这些经验丰富的军官眼中，下层船员却俨然具备了柏拉图笔下多头巨兽的一切特点——缺乏理性，难以驾驭，富于攻击性，因此不得不以铁腕治之。

不过仅有铁腕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运用这只铁腕的“人”——让我们再回到柏拉图关于灵魂的隐喻——还必须被赋予一种道德上的优势。绝对的服从是需要有绝对的正当性作为基础的；如果“人”会在道德上犯错，那么“兽”就有理由选择服从或者不服从，而这对纪律造成的损害是丝毫不亚于有罪不惩的。但如果假定“人”为永远正确，那么不管公平与否，“兽”就必须被拉来为一切罪错承担责任了。比利之所以被严惩就是因为他以下犯上，纵使他有一百条理由来证明自己无过，可一百条理由都抵不过他所代表的阶层有罪而克莱加特所代表的阶层无罪这一条设定。从这个角度看，比利的受难实际上是在为他所属的这个被设定为有罪的群体赎罪。^① 威尔很清楚克莱加特是个被“上帝的天使”打死的恶魔，但他将天使处以极刑，其实际效果就是把他所憎恶的恶魔追封成了圣人。

^① 作者强调比利“第二亚当”（即基督）的身份，强调他打死克莱加特前“耶稣式的表情”（《比》：459），并安排让一种神迹出现在他被处决时，显然就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无罪者比利身上的基督属性。不过比利救赎的只是船上的下层水手，作为舰长，威尔当然不在其列；后者是通过战死来完成自我救赎的。

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第 29 章所引述的对“战力号”事件的“官方报道”：

上月十号，皇家战舰“战力号”上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该舰兵器长约翰·克莱加特觉察下层船员中正酝酿某种阴谋，谋主名为威廉·巴德，便在舰长面前告发此人，却当场遭到报复，被巴德突然拔刀穿心而死。

案情及所执凶器表明，凶手虽以英人名姓被征入伍，但实为一混入我军的外国人，由于形势紧张人员短缺，此等异类在当前军中并不鲜见。

从被害者的品性看，案犯更是罪不可恕。克莱加特是一位可敬谨慎的中年下级军官。……他的工作职责重大，劳心劳力且易招祸患，但他的责任感却因其爱国心而愈发强烈。已故的约翰逊博士有句耸人听闻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如此荒谬的言论若还需一驳的话，那么克莱加特这样的例子便是对它最响亮有力的反击。（《比》：483）

这篇刊于海军喉舌的报道充斥着对事实的歪曲，但报道的作者却并非故意要撒谎，他的材料来自于谣言，而谣言则是以舰方对比利·巴德的判决为基础的。报道中的不实之词听起来非常陈腐平庸，可它们传递的核心信息却是一套明晰有力的关于善恶的道德话语：恶是发端并酝酿于“下层船员”中间的，而代表着战舰理性部分的军官克莱加特则为了制服这种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套话语不仅与古典哲学关于恶起源于灵魂中的动物性部分的教义高度一致，从发生学角度看，它甚至可能是后者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源泉。和蒙田一样，威尔船长也从他的实际观察中看到了这套话语的可疑之处，然而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挺身捍卫了这套旨在保证城邦战力和生存的话语的权威地位。恶源于灵魂内部败坏的对“自然”的虐待和滥用，但为了维护等级秩序，好的理性却把理性自身之罪转移到了自然的头上。

〔作者简介〕 陈雷，男，1972 年生，剑桥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研究和古典道德思想史。近期发表的论文有《黄金时代与隐身的王权——〈暴风雨〉的一种解读》（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 4 期）、《对罗马共和国的柏拉图式批评——谈〈科利奥兰纳斯〉并兼及“荣誉至上政体”》（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冯季庆